

●姚家华

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对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起了破坏和解体的作用，这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开始出现了同封建经济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本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求得中国的富强，除了要求封建政府实行变法改革，企图通过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外，同时还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思潮，要求以工业为中心来兴办中国的实业，通过兴办实业的途径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此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和导致国家的富强。“实业救国”的这种主张，无论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进行变法改革期间，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推翻封建专制清王朝的斗争期间，甚至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后，它始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存在，在中国近代时期众多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中国近代时期“实业救国”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可以张謇为其代表。张謇不但竭力主张实业救国，具有较完整的一套设想，而且还亲自创办了大量的企业，一辈子将主要精力从事于搞“实业救国”，企图通过振兴实业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和求得中国的独立富强。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身于一个富农兼商业的家庭。甲午战争前，他长期过着科举、游幕的生活。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这种形势，张謇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主张以设厂兴办实业来自救，认为要抵御外侮，士大夫应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职责，“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矍然自持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①，亲自投身于封建士大夫一向贱视的工商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创办各类新式企业，由封建士大夫向工业资本家转化。1885年，他根据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在南通筹建大生纱厂为始，从此走上了以创办实业救国的道路。张謇自在江苏南通筹建大生纱厂始，以后又陆续兴办了崇明大生纱厂二厂、资生铁冶厂、大有晋公司、广生油厂、上海大达轮船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内河轮船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数十个工商企业。同时，他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吕四盐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等16个垦牧、盐垦公司，垦牧、盐垦公司共占地455万亩，各公司已不再是封建的农业，而是首先在中国试图采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企业。张謇以大生纱厂作为母体扩展至其他的企业，所创办的企业涉及到纺织、冶铁、面粉、榨油、酿造、火柴、丝绸、机器、航运、公路、电力、制盐、盐垦、垦牧、房地产、金融、储栈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新兴的民族资本势力集团——大生资本集团。他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謇面对当时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民穷国弱的状况，怀着救亡和富民强国的愿望，认为实业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只有振兴中国的实业才是救国的途径。他针对当时“海陆军救国”、“教育救国”等论调，对富国与强兵、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只有经济才是根本，强兵和教育的发展必须扎根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富才能强兵，而富国的唯一办法则是发展实业，发展实业乃是救国的途径。故他说：“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②，指出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是根本，“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③。

张謇“实业救国”中所说的实业，包含着农、工、商皆在内，但以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为其中心。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④。他非常重视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⑤，“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⑥，故中国要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和西方一样，应着重于大力发展近代新式工业，并以此作为关键来带动农业、商业的发展。他指出发展近代工业使用机器生产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这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的生产落后状况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使产量增加、质量提高，而且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致富；同时，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后，大量农业的原材料也可变成工业制成品，从而为商业提供可获大利的产品，这也可大大改善原来只以原料出口而进口制成品徒给外商获利的状况，以便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利权不致外溢，最后达到富民与富国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在创办实业时关键是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只要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⑦，张謇把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视为实业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富民富国的根本，将实现国家富强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发展我国的近代工业上面，这应该说是具有一定道理的。

张謇在主张以实业救国时，还提出了发展实业应以棉、铁为中心，也即他所称的“棉铁主义”或“棉铁政策”。他在各种工业部门中特别重视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业，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就必须以建立和发展这两种工业作为中心，以此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以棉铁为中心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这样才“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⑧，以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而取得国家经济独立。张謇的“棉铁主义”，这是他根据本人经营企业的体会和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实际经济情况而提出的。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非常薄弱，故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必须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全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究今日如何致穷，他日如何致富之业”^⑨。张謇首先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作了分析。当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经济落后的缘故，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逆差，而在进口货中则以棉、铁的进口所占比例为最大。张謇根据清代光、宣两朝的《海关贸易册》指出：“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需用棉铁政策之说”^⑩。又说：“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⑪。他指出棉纺织品和钢铁是中国进口货的最大宗商品，每年进口额高

达3亿两左右，认为这是造成我国所以严重逆差的主要原因。为改变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和防止财富的大量外流，他认为必须针对当时国际贸易大宗的棉、铁两业加以迅速发展，只有以棉、铁为中心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才可减少外贸的进口，从而堵塞漏卮和收回利权。同时，他还认为棉、铁和国民生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两种行业既是国家的基本工业，又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棉制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在中国市场上一直销路最广，而铁则为制造生产工具所不可缺少，尤其是要发展本国的近代工业则更需要钢铁，故兴办这两种行业均可容易得到非常优厚的利润，从而使人民和国家致富。因此，他认为只要实行他的棉铁主义，即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棉铁工业，以棉铁工业为中心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便“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以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相抗衡。张謇的棉铁主义，认为首先发展棉铁工业，对外既可抵制进口，对内又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这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来说具有启发的意义。

张謇要实现其棉铁主义和以实业救国，但却又感到中国存在着资本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兴办实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他除了提倡从富人中设法集资外，还提出了利用外资来解决创办实业所需资本的方案，主张以“借款”、“合资”和“代办”等各种形式来充分利用外资，籍以创办企业以发展中国的实业。他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集一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于铁之煤为从要”^⑩，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除进行大量借债外，他认为与外国资本联合创办企业，这也是一种“利用外资最普通的方法”，并指出这尤其适应于“凡利害参半之事业用之。盖有利与外人相共，亏损亦然”^⑪，即凡是属于利害参半有一定风险的企业，可以采用中外合资创办的形式。同时，他认为“代办”也是利用外资的形式之一，所谓“代办”则是指由外商来承建某些企业，以企业的产品抵偿外商所投资本，在若干年后届期，企业则归中方所有，并指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之事业用之”^⑫。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张謇所经营的大生集团陷于困境时，张謇于1923年还甚至企图依靠外资之力来挽救中国民族资本所面临的危机和帮助解决民族资本所经营企业的困难，认为：“夫世界果不欲趋向大同，不欲以中国为市场，不欲中国发展供给各国之原料，则亦已矣。如其欲之，中国内地风气尚未尽开，资本又不充裕，试问舍全世界各国经济互助，有何别法”^⑬。他不惜以中国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供应地为条件，以求得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投资，并错误地称为这是实现所谓“经济互助”和“趋向大同”，以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可以帮助解决中国民族资本在经营企业时所遇到的资金不足等困难。

张謇一生致力于兴办中国的实业，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它顺应了中国人民要求经济独立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要求与愿望，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除了其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意义外，由于它应用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具有社会化形式和一定规模的大机器生产，这也是对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符合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一个积极的进步因素。故张謇创办的各种近代企业，在当时对于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及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张謇的“实业救国”，在当时却是一种错误而不可行的主张。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已由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和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主权，早已侵入中国并已建立起牢固的殖民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的发展。张謇为了解决兴办实业的资金不足困难，企图充分利用外资的主张与方案，这在国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以前，也只能是一种梦想。他所主张的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各个经济部门广泛进行投资，其实只能是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于当时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扩张的要求，使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场所，不仅不能建立起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而且还将使中国的实业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从而使中国进一步陷于殖民地的深渊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⑥。同时，当时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反动专制清王朝，也决不会允许其封建经济的对立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必然要对民族资本进行压制和加以种种束缚以维护其封建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如不首先解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推翻反动的封建专制清王朝这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要充分兴办实业和发展中国独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只能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在当时反帝反封建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时，尤其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已经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成为社会革命的主流时，所谓“实业救国”的主张不仅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而且还会起着转移目标和阻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良作用。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封建清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和阻碍新生产关系的旧上层建筑，才能为兴办新式工业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开辟广阔的道路，从而才能真正地摆脱中国贫穷落后和受人欺凌的局面而导致国家的独立与富强。

当时“实业救国”的主张，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含意，即当时不少的资本家利用实业救国其名来达到获取厚利之实。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曾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靡一时的口号，不少资本家也皆以“实业救国”来作为创办企业和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口号，但他们办企业的目的并非真正地为了救国和发展民族经济，而只是以“实业救国”的美名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幌子。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等人，就曾公开指出资本家提倡实业的真正目的并非真正地为了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仅是为了自己的获利。同样，这也可从张謇自己的一些言论中得到证实。例如，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时，就提出了要“以大利广招徕”^⑦，用高利润来吸引富有者投资入股。又如，1910年，他在关于“救国储金”的文章中，就建议将全部储金投资于有厚利可图的棉纺织业，以使既“获预于救国之美名，而又获众人皆知之厚利”^⑧。可见，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也是资本家经营企业的一种美名，而获得厚利才是其实。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张季子九录》。

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